《西线无战事》首度以最接近原版的面貌被重拍，也让我们再度审视这部被公认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它作为优秀文学作品的本质被长久地忽略了

杨懿晶

今年是德国小说家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诞辰125周年。他的成名作《西线无战事》被公认为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最著名和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在小说出版近百年间，被三度搬上银幕，而最新一版是首次由其母国德国进行影视创作投拍的德语版并由德国演员主演。这部由德国作家书写、从普通德国人视角出发的德语小说，终于得以用最接近原版的面貌与全球观众见面。

颇具意味的是，新版《西线无战事》代表德国角逐今年的奥斯卡，这部高举反战旗帜的电影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最佳艺术指导、最佳原创配乐等奖。

20世纪读者数量最多的德语小说

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以第一人称的手法讲述了主人公保罗和他的同学，满怀爱国热忱投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持续四年的残酷前线战斗中，目睹了可怕的伤亡及战争对人类肉体及精神的摧残，留下了对德国军国主义和参战目的的质疑。雷马克在前言中阐明，此书的目的既不代表内心的自白，也非对某个国家战争行为的控诉，而是给读者呈现了战争把年轻那一代的一切都毁了的悲惨命运。

写这部书稿是雷马克在柏林胡根贝格集团下属《体育画报》任职期间。他以自己的一战经历为素材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并借书中主人公保罗之口写道：“我还年轻，才二十岁，但是我认知的生命却充满不安、死亡和恐惧……我看见不同国家的人相互怨恨，默默无知、愚蠢顺从又无辜地互相残杀。我看见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发明武器，制造舆论，让这一切顺理成章地持续更久。各地和我一样年龄的年轻人都看见了这种事，我们这一代的人都经历了这种事。要是我们有一天站起来，走到父亲那一代的人面前，要他们说明这一切，他们会怎么做呢？……我们对生活的认识完全局限在死亡的议题里。未来到底还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1928年，《西线无战事》先是在报纸上连载，次年又以实体书的形式出版。这个名叫保罗·博伊默尔的年轻人的疑问立即引发了饱受战争之苦的一代德国人的强烈共鸣，雷马克也一跃成为最受瞩目的作家之一。小说的热度迅速扩展到其他国家，在它出版18个月内，就被翻译为22种语言，售出250万册。时至今日，这部20世纪阅读人数最多的德语小说在全球以58种语言发行超过3000万册，并成为反战文学一座绕不过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西线无战事》里的年轻新兵是怀着英雄主义的憧憬投身战场的。然而，当他们真正看到和经历了恐怖与死亡，战争粉碎了这群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的梦想，继而不断在夺走他们的生命，即便是那些幸免于难的人，战争也毁掉了他们的余生。保罗所在的八人小分队渐渐凋零，有人当了逃兵，其余大部分人都阵亡了；战争接近尾声时，保罗失去了最后一个战友。然而，对于此时的保罗，比起死亡，更可怕的反而是回家以后的生活，因为“我们再也不可能正常地过日子了”。战争结束前一个月，保罗倒在了寂静的前线，“当人们将他翻过来时……他脸上的表情很镇定，似乎很满意事情的结局是这样”。而那一天，西线战报没有任何冲突发生，也就是标题所示的“西线无战事”。迄今为止，这部作品达到了大多数战争文学难以企及的高度，随着时间的沉淀，它已然成为现代文化中象征战争之残酷和无意义的一个不言而喻的符号。

无论哪个时代的读者，都会为《西线无战事》中描绘的战争的残酷与冷漠所震撼。当士兵们在漫长的战事中失去了时间的概念，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简化为纸面上的数字，人们对死亡和恐怖的敏感也被逐渐消磨。随着机械化武器和毒气在战争中的大规模运用，生存不再关乎个人的英勇与否，而似乎完全取决于运气：“每个士兵都要经历好几千个偶然才得以活命。”小说的语言冷冽而犀利，通篇采用第一人称的现在式叙述；无论是对战争场面的描绘，还是对士兵心理状态的侧写，都给予读者一种几近窒息的压抑感。小说的情节并不完全呈线性发展，而是选取前线和后方几个带有标志性的节点，不断地在两者之间穿梭。这样的循环往复，磨灭的不只是士兵的斗志，更摧毁了他们求生的意志。或许是雷马克的新闻从业经历赋予他的战场“报道”强烈的画面感，他的描写让读者产生了身临其境的强烈共鸣。又由于小说完全从普通士兵的视角出发，再加上书中对个体情绪几近赤裸的写照，更凸显出个体面对战争机器的渺小与无措，以及普通人被历史裹挟的无奈与悲哀。

出版后饱受争议，库存一度被查封并销毁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小说出版伊始就在德国国内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阅读热潮，同时催生了大量同类型战争文学的创作与讨论，却也受到最多的争议。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下，本就背负了大量战争赔款的德国经济状况不断恶化，自1925年出现的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再度缩紧，下一次战争的阴霾又在远处隐隐作祟。随着小说的持续热销，针对书中影射的“战争是徒劳的”这一观点，德国国内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声，甚至在希特勒上台后，雷马克的全部作品遭禁，称其为“对战争中德国士兵的文学背叛”，《西线无战事》的库存也被全部查封并销毁。对于雷马克是否在书中夸大甚至篡改了自己的经历，人们争论不休，其关注度之高，甚至偏离了对文本本身的艺术评价。

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讲述了主人公保罗和他的同学，满怀爱国热忱投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持续四年的残酷前线战斗中，目睹了可怕的伤亡及战争对人类肉体及精神的摧残，留下了对德国军国主义和参战目的的质疑。图为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剧照

一部以“战争经历”为题材的小说，却引发了如此之大的舆论争议，其部分原因与出版社采取的营销策略有关。根据传闻，这部小说源自雷马克突发的灵感，用下班后的六周业余时间完成，几乎没有修改就原样出版了。小说中对战争的描写，包括保罗及其战友的大部分经历都是作者本人的亲历，而他之所以要创作这样一部作品，主要是为了克服自己的战争创伤。据雷马克在1929年6月的一次采访中所说，“我忍受着相当严重的绝望发作的折磨。就在试图战胜绝望的时候，我逐渐开始有意识地和系统性地寻找我之所以产生抑郁的原因。在我努力分析之下，我回想起自己的战争经历。我在许多熟人和朋友身上观察到完全类似的现象。我们每个人都烦躁不安、漫无目的……战争的阴影也恰恰笼罩在我们身上，即便我们完全不去想它。”而雷马克的出版商也试图佐证这种说法，在预印版的广告中称“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并非职业作家，而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抓住了机遇，在数月前突然迫切感到要用言语表达和塑造经历过的一切，从内心深处摆脱发生在他和他的同学身上的噩梦”。

这样的创作传奇，部分是出版社为了满足普通读者的期待而构建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雷马克研究和历史文献都表明，作家早在野战医院休养期间就开始构思这部作品，并从其他士兵那里收集相关素材。根据同时代人的回忆，他仅仅受过一次较为严重的伤，尽管他本人声称的数量是四到五次；而在战后接受的诸多采访中，他对于自己经历的战争细节也讳莫如深。根据目前流传的文稿来看，出版社曾要求雷马克对文本中批判性过重的内容加以删改，他也确实这样做了。并且，在小说出版前后，出版社在营销推广中强调雷马克为“一战中德国士兵的代言人”，还印刷了大量宣传册，这或多或少有暗示潜在读者的意思——只要购买一本《西线无战事》，就能够知晓雷马克在书中描写的到底是不是战争的“真相”。

理性的读者都清楚，以非虚构的标准去衡量一部虚构作品的价值，无疑是可笑的，因此，当我们更仔细地审视这段历史，就会发现，围绕《西线无战事》展开的这场“真相”之争，其实质是当时不同的政治派别针对战争集体回忆的解释权的争夺。随着该书的影响不断扩大，它受到争议之声越来越多，那些反对意见也早已脱离了作品本身，被各方各派别用来支持自己在当代战争语境中的不同立场。在这样的多方角力中，《西线无战事》作为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本质被或多或少地忽略了。

当今世界，重读又有别样的体会

首版于一战结束十周年纪念日前后的《西线无战事》，或许并非首部以个体记忆为叙事起点的战争小说，但它对生命悲剧意识的深入刻画让大众——尤其是德国读者——在主流叙事的国家神话以外获取了正视个体创伤进而重塑集体记忆的可能。历史披上虚构的外衣，让读者在不同意识形态交锋的夹缝中，接纳过去与现实之间的悬滞。透过纸页的想象，保罗的经历转化为每一个读者的阅读记忆，也将个体从自上而下的集体意识中解放出来。更进一步来看，它为战后的德国大众文化提供了一种“正常化”的叙事策略，在这样的视角下，作为个体的保罗们与其他国家的士兵一样，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从而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国家话语空间。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雷马克原本的写作计划包括了以《西线无战事》为第一枪的“三部曲”，第二部和第三部的主题是德国普通士兵在战后重返故乡却难以重新融入平民社会。也就是说，雷马克创作《西线无战事》的本意，不只是要记录战争的残酷，更是意在展示战争对人的精神和心理造成的创伤。后来，他在1963年的一次采访中提到，“《西线无战事》的成功，在于它更多的是一本战后之书，一本提出这一问题的作品：这些人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尽管在最终修订的版本中，这种着眼于后战争时代的追问在很大程度上被模糊了，但我们仍然能够从某些片段中窥见一二。例如，士兵们在军营里对战争结束后何去何从的讨论，保罗休假回家时感到的遗世独立，以及小说结尾处，作者为保罗安排的倒在和平前夕的那个结局。曾在战场上支撑过他们的一切，代表的却是人类文明价值的整体失败。不难想象，那些丧失了信念的个体，又将在战后的平民社会中遭遇怎样的错位与艰难。

事实上，《西线无战事》之所以能突破战争文学的范畴，跻身经典文学之列，恰恰在于它的那些没有言说的部分。小说没有提到任何确切的时间、地点和某场具体的战斗，也不曾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作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从客观、全知的历史视角去分析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书中借由士兵之口说出的针对战争荒谬的议论，尽管稍显天真和局限，却以个体命运的窥镜折射出所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一代人的悲剧命运。雷马克用自己的作品阐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战争创伤的阴影之下，即便是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人，也无法逃脱被异化为边缘人的困局，而其对个体在战后命运的关注，更展现出超越国别界限的人道主义立场。正因如此，这部作品才会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始终焕发着顽强的生命力，不断收获新的读者和讨论，尤其在区域冲突频发的当今世界，阅读这本书，又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体会。

（作者为青年翻译家）

相关链接

根据《西线无战事》改编的电影迄今有过三个版本。1930年4月，由好莱坞知名导演刘易斯·迈尔斯通改编的同名影片上映，随即摘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被誉为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反战影片之一。1979年，同为金像奖最佳导演得主的德尔伯特·曼将这个故事再度搬上银幕，色彩的表现力让镜头中的战场画面呈现出更多深意和张力。2022年，德国导演首度接过导筒，以更为震撼的风格重现了这部近百年前的文学经典，上映后广受好评。影片在上个月颁发的第76届英国电影学院奖上摘获七项大奖，并在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上摘得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最佳艺术指导、最佳原创配乐等奖。

浪漫海角的慰藉

——写在叶芝代表作《凯尔特的薄暮》首版130周年之际

向丁丁

疲倦的心，在疲惫之时，
远离那是与非的迷网；
欢笑吧，心，在灰色的薄暮之中再次欢笑；
叹息吧，心，在黎明的露珠之中再次叹息。

（王碧滢译）

这是叶芝深具神秘主义气质的短诗《走进薄暮》的开头一节，来自民间故事集《凯尔特的薄暮》最末一篇。

与叶芝去爱尔兰西部乡间搜集网罗，并故意以质朴的口头语言叙述《凯尔特的薄暮》的那个世纪之交相比，眼下的世界并不充溢更少的疲惫、迷惘和叹息。古怪的病毒，高耸的藩篱，脆弱的和平，迷雾重重的未来，人类发现自己离热望中后工业时代的乐园忽然闪退甚远，那么也许是时候听从叶芝，去往浪漫主义曾经许诺的天真、梦幻和无目的，从世界边角的本布尔本山、从白色山门所通往的精灵之国、从非比寻常的鼓崖之畔，寻找来自古昔、民间、农田、山野的慰藉，重新获得柔韧的力量。

没有一颗善感的心灵可以在读完《凯尔特的薄暮》之后不想在太阳西沉前的最后几个钟点造访思莱戈和戈尔韦的乡间。那是叶芝——或他与之交谈以获得故事的农人、村妇、吟游诗人、水手所相信的最富有魔力的时辰。在晨昏交接的珍贵钟点，本布尔本的白色山门缓缓开启，仙军奔涌而出；潮湿海岸沙地的浅洞传来音乐，矮小的精灵和着不知名的曲子起舞；着魔的树林中貂猫、獾和狐狸甚至白色牡鹿开始飞舞徘徊。人的世界与精灵鬼怪的世界悄然贯通，贫穷、迷信但善良坦荡的爱尔兰人与鬼魂、精灵、仙子和少有的魔鬼发生种种更似人间日常而非崇高仙境的交往、协商，甚至恶作剧，也领受各种谕示，承受违抗的徒劳和默契的甜蜜。

在这些想象力遄飞的民间故事中，常有婴童与新娘被仙子掳去，被诱拐者虽在无忧无虑的精灵王国，却始终牵挂凡界的母亲和爱人，哪怕自己注定终于如明亮的蒸汽般消失殆尽。人们与死后将去的世界相隔并不遥远，农夫们希望墓地那头的房子就像他们在人间的家，只不过那里的茅草屋顶永远不会漏雨，白墙永远不会脏污，橱柜随时都存满新鲜的牛奶和黄油。更重要的是，在这飘渺又温柔的薄暮中，人类和精灵鬼怪之间有着天然的感情和默契，哪怕会有恶作剧、反抗和惩戒，也并不会恶意地互相伤害，勇武的凡人甚至进入仙军中帮忙作战，而仙子不吝给出关于天气、火烛、健康的种种谕示，教给人们使用草药的精湛医术，甚至邀请人类参加彻夜舞蹈、磨掉脚指头而不自知的狂欢之夜。

将贫瘠的爱尔兰乡间与仙境相连，把口耳相传的传奇故事形诸纸端，并非一场单纯出于兴趣的文学冒险。事实上，这是作为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者的叶芝为祖国重写身份的最初一重努力。盖尔社会结束、部落贵族溃败逃亡之后，数个世纪的殖民史下，欧洲最西海角的爱尔兰不曾在残酷西风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在它强大的邻居和掠夺者英国人的视野和话语中，这四百万红发碧眼者是粗野、狡猾、终日醉酒的一群，是不可信赖、只堪被开化者统治的一群。这是爱尔兰人在英国漫画、小说、巷议中的固化形象，是作为小丑、恶棍的“舞台爱尔兰人”难以摆脱的污名。19世纪下半叶，曾答应穷苦人以讲述故事来抵交诊费的王尔德医生和夫人（奥斯卡·王尔德的父母），其后的叶芝、他的密友格里高利夫人，以及后来成为爱尔兰第一届总统的道格拉斯·海德，都曾沉浸于民间传说的收集，而他们的努力正是反用英国人对爱尔兰原始性的贬低，将一个神秘的、前现代的、凯尔特的爱尔兰，在文化上——对，先于政治的独立——从科学的、现代的、昂撒人的不列颠中独立出来，建构一种特色迥异的民族性。他们所使用的着意区别于文学语言的朴拙日常的语言又令这些故事极易回到来源的人民中去，当这些人民还挣扎于大饥荒留下的关于生存的噩梦，挣扎于在自己国土上失去土地、生计和尊严的惶惑时，叶芝和他同时代的故事收集者们擦拭蒙尘的历史，打开村落边角或湖泊涟漪中隐藏的神秘之门，展示了一种他们称为凯尔特的秩序，一种赋予困境甚至绝望中的人们以来处、确信和希望的语境。

这项工程的幽微之处更超过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想象。其后的文学史研究者们发现，此时爱尔兰岛内寻求独立的复兴运动者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围绕着何为爱尔兰、何为爱尔兰特性展开了文化政治的辩论和角力。既非天主教徒、亦非盖尔语书写者的英-爱文人叶芝在这场喧嚣的争夺中并无任何天然优势。但他绕开“天主教爱尔兰”和“盖尔爱尔兰”的标签，回到更具包容力、也更无确定边界的“凯尔特”语境。当有人蔑视他为“奉领着英王年金的英-爱贵族”时，采风者叶芝却已在以这一泛化框架下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也以基于此的诗歌、戏剧，着手构建一种超越自身所处阶级和文化背景的认同。他以忠诚之耳和想象之翼回到大饥荒之前、占领之前，回到无休止的战斗和流血之前，回到喧嚣吵闹的议会政治沉入失败之前，拥抱贫穷但简洁、闲定和优雅的古代世界。

与此后深受政治上的激进民族主义和文学上的现代主义影响的叶芝不同，此时的诗人是全然的浪漫主义者。这段时期是他在思莱戈的高山湖泊间度过的童年之延续，也是在都柏林和伦敦之外、在西部的漫游之中作为青年作家的渐熟时期。这位模样清秀而内心敏感的诗人徒手打捞断壁残垣中尚存的文明痕迹，并以思莱戈海崖所赋予他的诗歌之舌为之歌唱，甚至——如之后的历史所将见证的一般——以浪漫主义的歌声赋予祖国独立、尊严和吸引力。《凯尔特的薄暮》中的爱尔兰显然并非社会意义上真实的爱尔兰，更非政治意义上完整的爱尔兰。虽然仰慕者如诗人凯瑟琳·雷恩称其“半是爱尔兰编年史，半是叶芝的自传”；但也有更加激进和冷峻的怀疑者如其时年轻的乔伊斯，不无戏谑地改换其中几个字母，称之为“迷信的厕所”（Cultic Toilette），甚或此后历史中将被修正主义者质疑和推翻的文化幻象。

《凯尔特的薄暮》之后130年的世界，似已离那个原始纯净的仙境愈加遥远。叶芝一代的文化复兴者和民族主义者也无法想象，荒凉贫瘠的祖国会富有戏剧性地成为欧洲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仙子出没的海岛会成为高科技企业云集的软件之都，而最新一代的爱尔兰写作者如萨尼·鲁尼笔下，这里的年轻人与第一世界其他地方的年轻人无异地谈论着时髦的亲密关系、社交媒体和新的社会阶级。他们当然也无法想象，世界在盛极一时的工业化、全球化、后工业化等令人兴奋的浪潮之后，又会开始陷入疫病、战争、分裂、衰退的黯淡陷阱。当高歌猛进的现代性暂时搁浅，节奏缓慢而亲密坦诚的《凯尔特的薄暮》仍能给数代之后的读者无穷的慰藉。如果高山湖泊、田间地头和雪岭小屋中那些红面乡亲的嗓音曾令叶芝短暂地悬置了他的理性，如果那些关于人与幽灵之间充满惊奇、爱意和诙谐的交会曾令他对故土的生命力毫不怀疑，如果采集来的古老、随意、几乎不含任何道德寓意的故事曾成为他此后所经历的残酷内战、派系纷争、爱情失意、健康衰退之时的重愈药膏，那么重读《凯尔特的薄暮》，在这些故事已然完成民族意识使命的时代，在距离小岛河山万里之外的此处，在跨文化的善感的心灵之中，它还能再以摇曳炉火中的旧智慧、不变的温情、怀古的想象力和质朴的情感，再度给予我们——也许过度简单化，但从情感的角度十分可靠——的慰藉。在那些直接迸发于暮霭时辰的露珠和神迹之中，垂悬在铁锹和鱼叉之颠，乐道于幻视者和普通村民唇上的故事中，好年景和坏年景循环往复，胆怯者和勇敢者一样度过险境和美梦。困惑中的人啊，只需加入叶芝彼时的呼喊，“野蜂啊，野蜂，请再度临驾我们的世界！”

（作者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师）